

唐宋诗风流别史

TANGSONG SHIFENG LIUBIESHI

阮 忠◎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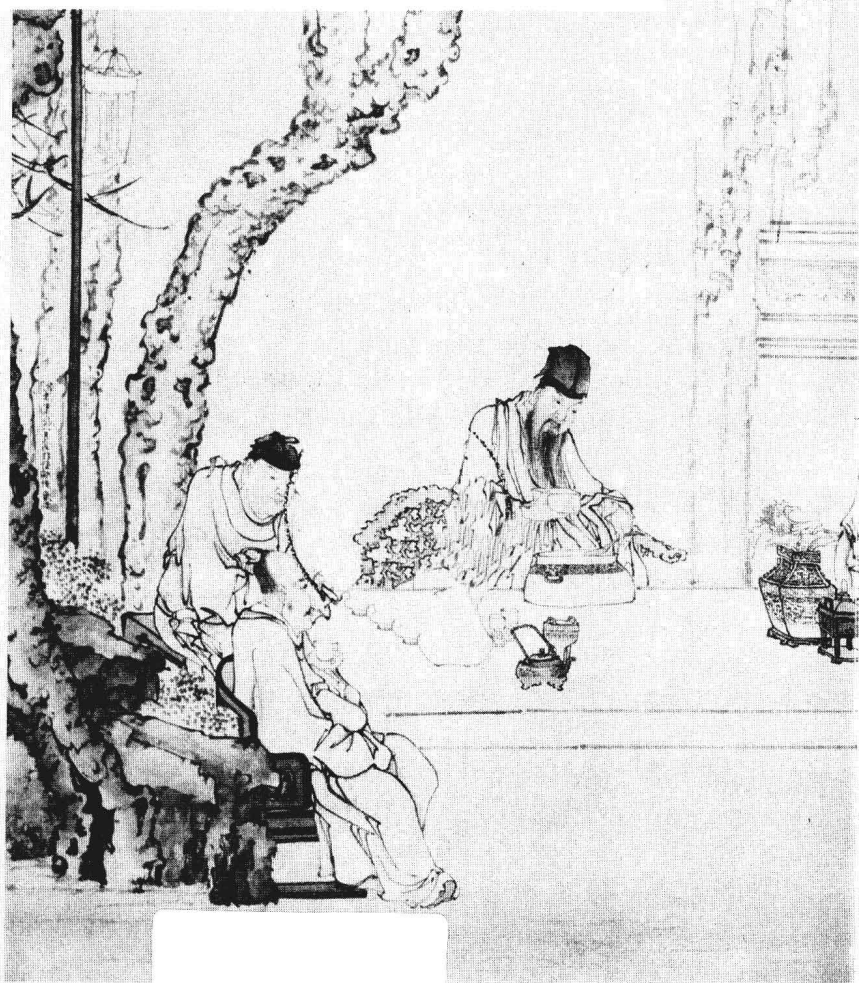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唐宋诗风流别史

TANGSONG SHIFENG LIUBIESHI

阮 忠◎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诗风流别史/阮忠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161-1137-6

I. ①唐… II. ①阮… III. ①唐诗—诗歌史—研究②宋诗—
诗歌史—研究 IV. ①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470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金 泓
责任校对 王应来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7
插 页 2
字 数 442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认识阮忠兄，是1994年在河南南阳召开的汉代文学讨论会上。当时，我对他的印象是年轻有为，成就突出，且又谦虚好学。后来又在北京一起开过会，特别是读了他的《汉赋艺术论》和《庄子创作论》，于是便越来越熟悉了。新近他又写了《唐宋诗风流别史》，请我写个序。对于唐宋诗，我虽然是从小就读，后来也教过这门课，并编过几个选本和写过一些小文章，但严格来说，还是没有进行过专门深入研究的。不过阮忠兄既然愿意给我提供这个先读手稿的机会，而我也正好乘机学习，于是就答应了。

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精美是举世无双的。在辉煌夺目的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最精美，且又最普及、最深入人心的，无疑是唐宋诗。试向全国、全世界作一个调查，看看有哪一个会说中国话的人，不会背几首唐宋诗呢？但也正由于唐宋诗本身的确好，所以相应的著作也就分外多。时至今日，有关唐宋诗总体性的全集、选集，各大家、名家以及各流派的全集、选集，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各种讲述唐宋诗的文学史、诗歌史，以及从各个不同角度写作的有关唐宋诗的专论，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用范仲淹的话说，“前人之述备矣”。那么阮忠兄的著作又给人们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呢？

司马迁写《史记》，有所谓“通古今之变”。而要想“通古今之变”，就必须将古往今来的学问融会贯通，既有对以往“老学问”的吸收、总结，又要有从现实出发、具有新时代气息的新视角与新观点。几年前我在读阮忠兄的《汉赋艺术论》时，见他把汉赋的发展分为“讽颂赋流”、“抒情赋流”、“说理赋流”、“咏物赋流”四大流向，并在“说理赋”中提出了“怪异吉祥文化”、“立名文化”对该类赋作的影响，不由得感到耳目一新。后来读他的《庄子创作论》，见他第一章研究庄子其人的三节

2 唐宋诗风流别史

标题是：“司马迁笔下的庄子”，“《庄子》中的庄子”、“历史进程中的庄子”。而在“历史进程中的庄子”一节中又分为“战国：孤立的庄子”、“两汉：潜行的庄子”、“魏晋：走红的庄子”、“隋唐：入仙的庄子”、“宋：入儒的庄子”、“明：入佛的庄子”，如此等等，既讲了本根，又讲了变异，仅一个开场白，竟如此广博淹通，一下子就激起人的阅读兴趣。

《唐宋诗风流别史》，顾名思义，是以研究唐宋诗歌不同风格、流派的特征，及其各自的发展源流为宗旨的。这是任何一部文学史、诗歌史以及作家专论全都涉及过，但又不可能细致讨论的问题。虽说其中的某些流派已有研究著作出现，如《大历诗风》、《江西诗派研究》、《江湖诗派研究》，但全面把握唐宋诗风的流别仍然是很有必要的。不过，唐宋诗歌领域博大精深，现在阮忠兄的专书对此一一展开论述，任务不轻。

长期以来，对唐宋诗风的研究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为一本研究唐宋诗歌风格的专门著作，这里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些问题，阮兄对这些问题作了认真的思考和探究。

其一，唐诗与宋诗的发展历程、基本差异以及对宋诗如何恰当地分析评价等等。对此，阮兄很关注历史发展的线索，从初唐的上官诗风开始，历经王孟的山水田园诗风、高岑的边塞诗风，直到南宋的江湖诗风收束。由于时代、社会环境以及诗人性情的差异，不仅是唐诗不同于宋诗，就是唐诗、宋诗本身也存在不同的特征。阮兄看到唐诗和宋诗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共性，诸如诗骚的言志传统、山水田园对诗人的吸引使他们寄情于山水田园。但唐诗不同于宋诗，“唐诗圆润浑融、雄放跌宕、沉郁清雅、自然俊逸并存。宋诗则不然，虽然诗歌风格中不乏豪放浑厚、深沉朗健，但在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和率性为诗中导致的生新瘦硬与平易疏淡同在。同时，唐代诗人好以诗言情，宋代诗人好以词言情，相对地在诗中淡化了自我的情感，使宋诗不同于唐诗”。阮兄努力在论述唐诗和宋诗风格流别中表现出它们的不同。

其二，大作家与各种流派的关系。事实上凡是被归入某一“流派”的作家，往往是二三流的，如果严格只讲“流派”，则大作家将无法写入。但如果讲唐宋诗不讲李白、杜甫、苏轼、陆游，那所讲的还能代表“唐宋诗”么？这是论述唐宋诗风之流不可避免会遇到的问题。对此阮兄注意到这些大家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哪一个诗人群体，诗歌风格不属于哪一个诗风之流，但他从这些诗人在唐宋诗坛上的地位和他们与唐宋诗人、

诗歌风格的内在联系考虑，认为“这些诗人独自的诗歌成就足以与唐代或宋代某一个诗歌风格之流相颉颃”，“他们表面上未入哪一个诗风之流，实际上，他们以自己诗歌的深厚魅力无形中处在一个诗风或几个诗风之流中”，所以毫不犹豫地开辟专章将这些大作家一一写了进去，并作了不同的艺术处理。或着眼于诗歌风格之流的完整面貌，或着眼于诗歌风格的影响，使二者在内在的联系上构成一个整体。

其三，各流派的渊源、嬗变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这些是各书都会讲到、但又往往不可能充分展开的，对此，阮兄从“诗风流别”这个角度进行梳理，以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目光注意到诗人群体和诗歌风格发展、演变的过程。上官诗风受齐梁诗风的影响，上官仪之后，上官诗风在“初唐四杰”、沈宋、陈子昂努力下的变化及五言古风对上官诗风变化的促动；陶渊明、谢灵运的诗歌风格对王维、孟浩然诗歌风格的影响以及唐诗对宋诗影响的深远，在不同的诗风流别和诗人中的体现；高适、岑参较少接受王之涣、李颀、王昌龄边塞诗的表现形式和风格，较多地接受唐太宗、骆宾王等人边塞诗的影响等等，可以说是做到了寻流溯源。这样，既使全书有了历史的纵深感，又便于读者对某一种诗歌风格来龙去脉的把握。同时，他又注意诗人相互之间的联系，如以王维为轴心讨论他和其他山水田园诗人的关系，以韩愈为轴心讨论韩孟诗人群体之间的关系，使他笔下的诗人群体更具有“群体”的特征

其四，同一流派中的“异”与不同流派中的“同”，以及大作家与这些“流派”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有许多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问题，极其麻烦，极难说清，对此阮兄也都尽量一一作了说明。如“诗歌风格的清丽幽怨中，孟浩然入世情深，王维入世情浅；浑厚雄奇中，孟诗厚重，王诗灵巧；素朴宁静中，孟诗热烈，王诗冷寂”。“趋奇的韩孟诗人群体，韩愈诗奇壮，孟郊诗奇涩，贾岛诗奇淡，李贺诗奇诡，卢仝诗奇诞”。还有江西诗派的“生新瘦硬”，黄庭坚、陈师道、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人风格的同与不同。阮兄在论述中，努力突出唐宋诗人在某一诗歌风格之下的共性与个性，并注意到在共性下的诗人彼此之间细微的差异。他不回避传统评价而标新立异，但在求“同”与求“异”中，运用比较的方法来审视这些诗人及其诗歌风格是很有意义的。所以他可以同时关注一群诗人，也可以在同一本书中先后讨论李白、苏轼、陆游诗歌风格的豪放，在论述了韩孟诗人群体的以文为诗以后，还论述了苏轼的以文

4 唐宋诗风流别史

为诗。

阮兄在“引论”中对本书的特点和研究方法作过简明扼要的说明，这里也就不再多说。总的来看，阮兄的《唐宋诗风流别史》没有故意求奇，却能够在探讨唐宋诗歌风格中，力求务去陈言，意从己出。而且，他在这本书里注重诗歌风格的流变、异同，在探索源流和比较研究中，往往从唐宋诗歌风格承传及内部运动的规律入手，使这本书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史或者古代诗歌史。同时，便于他涉及一些不太为人注意的诗人和诗歌现象，像上官婉儿、王梵志以及诗歌写得并不出色的晚唐咏史诗人胡曾、周昙等都被提到。阮兄显然是在追求与传统文学史或者诗歌史的不同，又力求贴近唐宋诗歌风格的本色，他在爬梳材料、论述剖析上确实作了很大的努力。不过，这本书也许是受了“流别史”之“史”的制约，尽管从“流别”的角度出发对唐宋诗人有所取舍，但时时注意所写的是“史”，不免有过于求全的倾向，对诗风流别的论述多少有点冲淡。尽管如此，读《唐宋诗风流别史》，也如读《汉赋艺术论》与《庄子创作论》一样，使人感到这是一部具有“立体感”的著作，从著作中可以使人突出地感受到作者那种高屋建瓴的“通古今之变”的精神与气魄，也使人在认识问题的角度与思考问题的方法上受到新的启示。

恭祝阮兄《唐宋诗风流别史》的问世。

北京师范大学 韩兆琦

1997年10月

目 录

序言	(1)
引论	(1)
第一章 上官诗风	(14)
一 朝代转换的诗风遗传	(14)
二 贞观诗坛的诗人景观	(18)
三 上官诗及其典型风格	(24)
四 上官诗风的变易	(29)
第二章 王、孟诗风	(41)
一 山水田园诗的历史风采	(41)
二 山水田园诗的初唐之音及王、孟诗人群	(45)
三 王、孟诗风的三重境界	(54)
四 王、孟诗风的唱和与流衍	(67)
第三章 高、岑诗风	(71)
一 边塞诗的兴起与诗人心态	(71)
二 为高、岑开先路的边塞诗人	(74)
三 高、岑性情及其边塞诗基调的确立	(80)
四 高、岑边塞诗风格的呈现	(85)
五 高、岑边塞诗的盛唐和声及其承续	(95)
第四章 李白诗风	(102)
一 好道崇侠而宗儒的诗人性格	(102)

2 唐宋诗风流别史

二	桀骜愁郁的自我形象塑造	(109)
三	以历史韵味酿造的厚重深沉	(114)
四	引神话传说入诗的奇幻之美	(119)
五	状景言情的豪俊超迈与清新飘逸	(124)
第五章	杜甫诗风	(129)
一	欲兼济而穷愁的痛苦人生	(129)
二	再现社会生活的诗史精神	(136)
三	家国一体与人我观照的二重奏	(142)
四	状物抒怀以寄情寓意的纡曲沉郁	(147)
五	清丽俊秀及奇崛病丑的艺术创造	(151)
第六章	大历诗风	(156)
一	大历诗人群体	(156)
二	大历诗风的艺术品性	(162)
三	大历诗人的双杰刘长卿和钱起	(174)
第七章	韩、孟诗风	(182)
一	韩、孟诗人群体	(182)
二	苦吟及尚奇的创作趣味	(187)
三	骋思趋奇的缤纷华章	(192)
四	以文为诗及淡泊清雅	(202)
第八章	元、白诗风	(206)
一	元、白诗风的内涵与元、白诗人群体	(206)
二	唐诗趋俗与为元、白先驱的乐府诗	(213)
三	元、白诗歌创作理论及其乐府诗风	(216)
四	酬唱时俗与元、白酬唱诗格调	(225)
五	悲悯凄婉的感伤之作	(230)
第九章	温、李诗风	(236)
一	诗的晚唐与温庭筠、李商隐	(236)
二	娱情寄意的辞采艳丽与情韵绵邈	(246)

三	咏古伤今的朴素质实及情与理偕	(254)
第十章	白体诗风	(262)
一	白体诗人群体	(263)
二	白体诗人的创作心态	(266)
三	白体诗的风格	(270)
第十一章	晚唐体诗风	(277)
一	晚唐体的兴起	(277)
二	吟风咏月蕴含的人生情韵	(281)
三	纤秀的构思和疏淡的语言风格	(287)
第十二章	西昆体诗风	(291)
一	西昆体及西昆诗人说	(291)
二	属意用事追寻的富丽典雅	(295)
三	咏史状景的华美风姿	(301)
第十三章	苏轼诗风	(306)
一	苏轼诗风前驱者的导引	(306)
二	贬谪颠沛的人生旅程与创作思想	(313)
三	率性以文为诗的自由通脱	(318)
四	豪放恣纵与粗犷轻盈的并行	(323)
五	理寄情景之内而趣出情景之外	(329)
第十四章	江西诗风	(333)
一	江西诗派的诗人群体及一祖三宗	(333)
二	江西诗派的诗歌创作理论	(339)
三	江西诗风典型的生新瘦硬	(345)
四	江西诗风的变异	(352)
第十五章	陆游诗风	(361)
一	中兴四大诗人中的尤、杨、范说	(361)
二	陆游诗歌的本源与创作理论	(367)

4 唐宋诗风流别史

三 英雄气概与忧愤情怀的张扬	(372)
四 豪放沉着与明快朗健的特征	(377)
五 浅里有深与平中蕴奇的滋味	(382)
 第十六章 江湖诗风	(387)
一 江湖诗人群体	(387)
二 江湖诗人的诗歌传统与创作理论	(397)
三 小巧浅易清淡自然的风格及其他	(402)
 结语	(411)
 主要引用书目及参考文献	(416)
 后记	(420)
 再版后记	(421)

引 论

历史真是深富韵味，隋朝的江山只维持了不足三十年，就为李唐王朝取而代之。这样沉痛的教训就像秦朝灭亡后给西汉人高悬警钟一样，唐初的统治者有隋朝的前车之鉴不敢掉以轻心。因为社会的演进，唐太宗李世民距离汉高祖刘邦好几百年，有历史的教训使他比汉高祖高明得多。汉高祖得天下之初，自认为是在马上打的天下，哪里把《诗》《书》放在眼里？所幸他的悟性极好，大儒陆贾又敢直言，说陛下能在马上打天下而不能马上守天下，使刘邦心惊，当即改变态度，要陆贾为他总结秦灭亡和汉兴盛的原因，从此开了西汉的“文”治之风。唐太宗则不然，贞观元年（627）大宴群臣，宴会上奏他当初为秦王时从民间征集来的“秦王破阵乐”，以示不忘根本。大臣封德彝讨好唐太宗说：“陛下以神武平定了海内，哪里是文德可以比的呢？”唐太宗正色道：“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①唐太宗视民为水，视国君为舟，认定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居安思危，举贤授能，从谏如流，发展社会经济，减轻百姓负担，造就了“贞观之治”的社会局面。

唐太宗之后的唐高宗、唐中宗、唐睿宗昏懦，故有武则天称帝、韦皇后专权。到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励精图治，朝政才得到改观，渐有开元鼎盛。这刺激了唐玄宗开疆拓土和奢华享乐之心，在他执政的后期，生活放纵，轻忽朝政，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巨变的标志，其后，社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即唐德宗、唐宪宗的“中兴”，只是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使唐代社会已没有早年的兴盛气象。晚唐的“牛李党争”加剧了唐王朝的衰微，朱温在907年废唐哀帝建立后梁，历时近三百年的唐王朝灭亡，开启了五代十国先后七十余年的纷争，天下

^①（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6页。

分裂。

960年，后周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兵变称帝，改国号为宋，史称北宋，赵匡胤为宋太祖。北宋王朝先后征服后蜀、南唐、吴越、北汉，国家重归一统。宋太祖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的策略，集兵权于己身，避免了藩镇割据局面；又集中财权，加强中央管理，确立了国家的基本体制，也兴了文治之风。北宋从仁宗之时起，朝廷苟安，国家渐显贫弱，于是有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欲除弊政，富国强兵，均告失败。而辽与西夏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又有女真族兴起，建立了金王朝。后金人南侵，宋徽宗、宋钦宗被掳，北宋灭亡，时为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史称“靖康之难”。南宋王朝怯于抗金，朝野的战与和之争一直存在，主和派多占上风，故有宋高宗的“绍兴和议”、宋孝宗的“隆兴和议”、宋宁宗的“嘉定和议”，它们构成南宋王朝抗金的失败史和屈辱史。待南宋与蒙古联合灭金之后，蒙古南侵，立国称元，继而灭了南宋。

社会生活对文学的影响无时不在发生，并因文体的差异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诗歌尤其是如此。

唐太宗在文学上不像在政治上那样富于革新，隋朝曾想反掉南朝以来竞骋文华于月露风云的绮靡文风，因祚浅命短，使这种文风走过隋朝进入初唐。唐太宗就是这种文风的继承者。唐太宗不以诗名世，但因循汉武帝、魏文帝故事，既以诗抒怀，又自为宫体诗娱情。不过他不愿以诗文妨政，曾批评西汉司马相如、扬雄和东汉班固的赋，说是“文体浮华，无益劝诫”^①，希望文学能够有益于社会生活。同时，唐太宗作诗常要群臣赓和，开创了唐代诗坛的一种景观。唐太宗之后奉和应制之作纷起，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热情，如清人牟钦元《唐诗排律序》说“贞观、开元之初，最多御制篇什。上倡其鸿制，下演其清音，洋洋洒洒，标为一代正始之音。于是沈、宋发其源，王、孟标其秀，李、杜造其微，各挟日月之精英，钟川岳之瑰丽”。这种特殊的诗歌创作局面，导致皇帝和诗人交往密切、友谊深厚。从唐太宗开始，诗歌就成了诗人与皇帝沟通的工具。李义府初赖李大亮、刘洎之力得见唐太宗，太宗令他咏乌一首，李义府咏乌求官；武后游龙门，命群臣赋诗；唐德宗与学士言诗于浴堂殿，夜半不寐；唐明皇召李白进宫，下阶步迎，赐食而亲手调羹；唐宣宗必询进士的诗赋

^①（唐）吴兢：《贞观政要·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22页。

考题，白居易死，作《吊白居易》以悼之。宋代帝王对诗歌的感情不亚于唐代，宋太宗好诗，每进士及第则赐宴，赐诗，他还写有组诗《逍遥咏》和《缘识》以见对诗歌的兴趣，也开了宋诗说理之先。宋真宗听政之暇，博览群书，每读完一本就有所咏，要近臣赓和。宋仁宗仿太宗故事，在位42年，赐诗尤多，虽然有的诗不一定出自他的手笔，但依然是好诗的明证。如此代代相传，致使诗歌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帝王对诗歌的兴趣，影响到朝廷把是否具备诗歌创作才能作为选拔、任用人才的标准，这就是科举的以诗赋取士。唐沿隋制，依科取士，设以诗赋取士的进士科，为地位卑微的寒门之士开了入仕的门径，许多士子看到前途的光辉，孜孜以求。其所考不尽是诗赋，但不可少的是诗赋。然而，科举制度对唐诗发展的促进不在应试诗，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就说过，应试诗少有佳作。原因是应试诗限韵限时，应试者在巴望金榜题名的心态下，搜索枯肠，仓促成篇。祖咏的应试诗《终南望余雪》之所以成为名篇，广为流传，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违背了考试要求写五言六韵十二句的排律一首的规则，他只写了四句，率性尽意之后飘然离去。以诗赋取士对诗歌发展的重大影响其实在考场之外。

按照当时的考试制度，考生的中与不中不完全取决于试卷本身，而要 and 举子平日诗赋创作的成就一起综合考察，形成举子考试以前的行卷与温卷之风。举子率先以诗求得名人品题，提高身价，是自荐以助中举之方。初投为行卷，几日后再投为温卷，自然迫使以诗赋应试的士子在考场外多竭尽心力磨炼诗歌创作的功夫，许多著名诗人都走过这条创作道路。李白从四川到长安，以《蜀道难》示贺知章，贺知章读了之后，称李白为谪仙人。白居易到长安后，以诗拜见顾况，顾况见其名“居易”，有意调侃说：“米价方贵，居亦不易。”当他读了白居易呈上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随即改口道：“道得个语，居即易矣。”有顾况的推引，白居易声名大振。行卷与温卷对于应举的诗人不是小事，诗的佳与不佳，宜与不宜关系到应举者的前途，引起一些人剽窃他人的诗文以获得显名高誉，明代王世贞就说：“唐自贞元以后，藩镇富强，兼所辟召，能致通显。一时游客词人，往往挟其所能，或行卷赞通，或上章陈颂，大者以希拔用，小者以冀濡沫。而干旄之吏，多不能分别黑白，随意支应。故剽窃云扰，谄谀泉涌，取办俄顷以为捷，使事恒订以为工。至于贡举，本号词场，而牵压俗格，阿趋时好。上第巍峨，多是

4 唐宋诗风流别史

将相私人，座主密旧。甚乃津私禁裔，自比优伶，关节幸珰，身为军吏，下第之后，尚尔乞怜主司，冀其复进。是以性情之真境，为名利之钓途，诗道日卑，宁非其故？”^①除了行卷、温卷之外，还有应有司要求，纳省卷一事，即应举者事先把自己的诗文编定，交纳礼部，供礼部先行考察。

北宋初年，科举一仍唐制，诗赋依旧是进士举的必试科目，举子于诗赋趋之若鹜。宋太祖开宝五年（972），有人告发主考官李昉徇情取舍，宋太祖亲临，召见落第者，择195人，开殿试，别试诗赋，可知诗赋决定着举子入仕的命运。苏轼就曾说：“昔祖宗之朝，崇尚词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②这表明以诗赋取士对于诗赋自身发展所产生的巨大作用。然到宋仁宗嘉祐年间，诗赋仍是科举之目，但因社会以古文为贵，又受王安石变法的冲击，诗赋势头渐衰。王安石认为：“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③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他废以诗赋取士的通则，用经义论策取士，几年后才重新恢复诗赋取士，将经义、诗赋分科，研习诗赋者多，专攻经义者少。这种取士制度一直流行到南宋，有“自经赋分科，声律日盛”之说，以致宋高宗感慨从前举子不读史，今则不读经，不出几年经学就废了。科举对诗歌发展的推动力量是很大的，宋毕竟不同于唐，宋为防止科举舞弊，宋太宗兴糊名考校；宋真宗时，又废行卷、纳省卷。这没有给科举对诗赋的影响带来根本的冲击。

唐宋又是思想开放的时代，儒、道、佛三教并立。唐太宗尊孔，明言不可须臾无尧舜之道、周孔之教，在国学设孔子庙堂，征召儒士为学官，诏令传习《五经正义》和以经义取士，使天下靡然向风。同时，唐初又奉道、佛。奉道，以老子李耳为先祖。唐高祖曾在武德八年（625）为儒、释、道三教排座次，道教居首，次为儒，再次为佛。高祖开了先例，唐高宗、唐玄宗都为老子追封尊号，唐玄宗还开崇玄馆，立玄学博士，研习玄学一样可以中举。奉道，满足了人们成仙的心理要求，使唐代的一些皇帝在信奉道教的时候，为成仙而走了炼丹吃药的道路，不意早早枉送了性命。奉佛，自隋入唐的佛教三论宗和天台宗虽不及禅宗兴盛，但不影响

①（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15页。

②（北宋）苏轼：《苏轼文集·拟进士对御试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1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选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69页。

帝王奉佛的虔诚。唐太宗曾下诏普度僧尼，建立寺庙，支持、鼓励译经布道。武则天宣扬自己登帝位乃是超越于天意与民意之上的佛意所致，故崇佛且把佛教置于道教之先，同时倾注四海财力兴建巨大佛像，像成之日，亲临拜祀。其后，唐玄宗、唐德宗、唐宪宗都信佛，直到唐武宗李炎鉴于佛教势力对朝政的影响和自己对道教的迷恋，在会昌五年（845）宣布废佛，于是寺庙锐减，僧尼大量还俗。唐武宗之后，唐宣宗下诏恢复佛教，佛教却再不可能有以前的兴盛了，而这时距离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只有30年了。

宋代儒学更盛。宋太祖初立国，即欲令武臣习儒，以明治国之道，开了崇儒的风气。随之，宋太宗访求古籍，宋真宗把儒学十三经颁行学官，宋神宗立太学三舍法，宋代儒学彬彬大盛。与唐王朝相仿佛，宋代帝王奉儒也奉道、佛。宋太宗曾诏令收集、整理五代以来散佚的道教典籍，修建道观。宋真宗效法宋太宗，派人校道经、修《道藏》。宋徽宗更是痴迷道教，自称为教主道君皇帝。宋代奉佛也是从宋初开始的，宋太宗时建筑寺庙、翻译佛经；宋真宗深恋佛教，撰《崇释论》，对社会影响深广。作为佛教宗派，禅宗的影响最大，其次有天台宗、华严宗行于世。宋代的儒、道、佛三教并兴导致的三教融合比唐代的三教相互吸引更有理论上的自觉，北宋道教思想的代表人物张伯端就曾说，教虽分三，道乃归一；于是，儒、道、佛的互释现象屡见不鲜。三教并行，原本保持着各自的思想特征，但它们处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信奉一教者与兼奉三教者相互渗透成为自然。相应地，唐宋诗人中信守儒学的诗人有之，兼收儒、道、佛之学者也有之。奉儒，以诗歌讽谕社会是唐宋诗歌的创作主线，无论哪一个时期的诗人，都曾以诗切入现实生活，表现百姓的苦痛和人生理想。如杜甫、陆游，他们不管处在怎样的生活环境中，忠君、爱国、恤民的情怀不变，鲜明地体现了儒学诗言志的传统。道、佛对诗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道教思想渗入诗歌引起诗人创作的游仙风气和奇幻思致，佛教思想则把诗人导入脱俗而宁静淡泊的境界之中。由于各种思潮的价值取向不一样，儒家思想的影响使诗人重视现实，佛、道思想则劝人疏离现实，在来生或仙界寻求灿烂的未来，造就了诗人们不同的诗歌风格。

除上述之外，唐宋诗坛以诗相应酬的风气很盛，诗成为人际交往的桥梁和情感的纽带。初、盛唐时期，人们以诗歌相应酬较多偏于情感，直抒胸臆或寄情于景。有的诗人发展了应酬诗中的叙事成分，产生了类似书信

的应酬诗。较早的是张说的《代书答姜七崔九》、《代书寄吉十一》，高适的《酬裴员外以诗代书诗》等。其后，中唐的白居易写了《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元稹则写了《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在实际上是书信了。这影响了整个诗坛的创作趣味，像元稹、白居易以诗相唱和就带动了一时的诗坛风气。应酬风习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不是纯情的，诗人求仕，力谋兼济天下，应酬之作有时难免渗透了这种因素。如孟浩然求仕而有《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诗中全不涉及官字，张九龄心领神会，被贬到荆州以后，没有忘记孟浩然的请求，果然给他一个官职。王维求仕给张九龄写了《上张令公》诗，张九龄提拔他为右拾遗。这些行为鲜明地昭示了当时社会流行的干谒风气，诗人以诗奉迎权贵，表达自我欲入仕的诉求；又在应酬诗里施展自我的才华，使诗歌创作长盛不衰。在这方面宋代与唐代社会有共通之处，诗人以诗歌为生活，相互之间的情感交流往往采用诗歌形式，并从北宋初年延续到南宋末年。

诗歌的发展有自身的沿革和规律，审视诗歌风格形成和流衍的历史，可以看到这样的诗歌传统：

言志传统。诗歌的言志传统是《诗经》确立的。《诗经》本称为《诗》或《诗三百》，它在西汉渐渐疏离本名而被人奉为经典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它既是文学，又是社会学；既是道德指南，又是政治方略。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经《毛诗序》申论，《诗》言志凸显出来，文学的色彩渐淡而社会政治的色彩益浓。步《毛诗序》后尘说《诗》者比肩接踵，《诗》的现实意义超越了它自身。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志与情为一，“缘事而发”，《诗》的这种精神和以《毛诗序》为代表的社会认识影响着新诗人聚集在诗言志的旗帜下，以诗表现自我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生活。继之而起的主要是汉乐府诗和东汉末年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①。这种措施终究没有使两汉诗歌发达起来。现存的两汉民间乐府继承《诗经》的言志传统，叙苦乐、诉衷情，为人称道。《古诗十九首》作为成熟的文人五言诗重在表现诗人的人生感慨、怨女空房独守和游子背井离乡的悲愁，享有“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

^①（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56页。